

陳方安生一錯再錯破壞溝通

□李繼亨

指點香港

李柱銘與陳方安生在經過長達九天的美加之行後，於13日返回香港。與此同時，約五十名立法會議員也經由上海返回香港。顯而易見，議員訪美之行有助於政改的溝通，而陳方安生二人的訪美之行，卻是為政改製造障礙，更是意圖破壞政改溝通。陳方安生自從十二年前離開特區政府之後，所做所為一錯再錯，此次甘願成為美國反制中國的政治工具，更有可能破壞來之不易的2017年普選，負面影響深遠。

在美國的七天行程中，陳李二人參加了最少十二場活動，會見了二十多名美加政要。行程極其緊密，如非數月之前作好安排，斷不可能如此順利。當中若無美國人的從中主導，要想得到如此大的「國際影響」更是不可能之事。

回顧其行程，3日接受彭博社訪問，批評中央對港政策；同日出席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事務委員會座談會，公然抹黑香港；4日與民主黨佩洛西會面、出席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去十二年來的第二次香港閉門「聽證會」；5日，得到美副總統拜登的「偶遇」，二十多分鐘的秘會其間二人到底說了什麼，外界無從知曉。

綜觀這些行程，拜登「偶遇」自是反對派值得興奮之事，而更令反對派感到「振奮」的還在於，美國「應要求」採取了實質性干預措施。4月14日，返港後的李柱銘向傳媒透露，美國國會將重啓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該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

每年向國會提交香港報告，但已經在2007年終止。美國媒體引述美國國會資深幕僚的話稱，已經收到李柱銘建議，但礙於時間有限，短期內難以實行，預計要等到明年。

可以預見，由於陳方安生李柱銘的「功勞」，美國在今後政改關鍵的一年時間裡，必將採取更多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之事。有分析稱，2004年美國眾議院曾通過一條「支援香港自由議案」，這種做法很可能在未來重演。美國當局會採取同類的手段干預香港的政改議題，值得高度警惕。

破壞溝通 危及普選

由於陳李二人言行實在「太出位」，引起香港輿論的廣泛批評。而4月5日，針對陳李在美國的一些言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按照基本法推動政制發展屬於特區內部事務，外國政府應尊重這個原則。發言人強調，當前香港正處於敏感時期，希望美方在香港事務上謹言慎行，不要讓香港問題干預中美關係。

不僅如此，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於「陳拜」會之後作出嚴正表態，「特區政府正依法推進有關工作，美方做法完全錯誤，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及堅決反對，希望美方由中美關係大局出發，切實尊重中方立場及關切，不以任何形式干涉香港內部事務。」洪磊又指出香港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取得巨大成就，強調香港政治發展是中國內

政，任何外國不得干涉。

中央政府對事件的高度敏感，陳李二人應當充分了解，但仍然如此明目張膽，無法不叫人去質疑其背後的真正目的。難道是為了促進普選？還是要幫美國「重返」香港？

事實上，陳方安生在紐約出席亞洲協會研討會時的一番言論，露出了她真正的意圖。她舉例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去年評論香港「一國兩制」落實情況「稀疏」，而英國政府每半年向國會提交的香港報告書，「幾乎是一份形式化的報告」，甚至美國及德國駐港領事對香港事務評論都更為高調。

此番言論從另一個側面反映，過去依賴英國當局的陳方安生，由於不再被重視，正在試圖與美國當局建立「聯繫」，並藉此來重建自己在香港的影響力。而這些做法的代價，卻是犧牲香港的普選進程。事實上，如果陳方安生希望中央政府因應美國當局的「表態」而立即調整政策去「配合」，這是極其荒唐可笑的。不論陳方安生出發點如何，客觀上，香港政改的溝通氣氛，因此受到影響；增加了中央對反對派的戒心與不信任。

過去陳方安生被西方捧為「香港良心」，十多年過去了，「香港良心」的說法幾近絕跡，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陳方安生一錯再錯，屢次在香港政治關鍵時刻作出驚人之舉，但與過去的失敗結果一樣，陳方安生不過是又一次消費自己的僅有的影響力，然而對香港大眾的整體利益，顯然是有害而無益的。

自強不息

立法會議員 郭偉強

最低工資加幅須體恤基層

最近一個青年活動上，與學生交流對2015年最低工資檢討的期望。最低工資委員會剛於上周一宣布，就本港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展開公眾諮詢，至5月18日止。社會各界可就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供意見。

2011年最低工資實施後，基層打工仔工資雖獲得改善，但在高通脹的環境下，基層生活依然困苦。在2013年的調整，由28元上調至30元增幅只有7.1%，無法追上2011至2013年的累計通脹。政府統計處早前公布，在2014年2月份，綜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一年間錄得按年升幅為3.9%，通脹已蠶食了上調的2元，俗語所謂「愈窮愈見鬼」，便是基層的心聲。

最低工資升幅落後於通脹，在百物騰貴下基層打工仔女面對變相減薪的困境！當中租金的升幅更令市民叫苦連天，「捱貴租」迫使打工仔節衣縮食，生活水平不升反跌！早前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1月份為連續8個月上升，累計升幅3.55%。其中，基層家庭普遍租住的細單位租金，亦錄得累升4.5%。須知道上述只是平均數字，筆者未聽聞加租加數十元的故事，通常一加便是上百元，只有全面調整工資水平才能應對。

最低工資按年上調是必然的，除了考慮目前的數據外，還要考慮未來兩年的通脹及經濟預測。2011年的最低工資水平，是參照2009年第二季調查的統計結果。即是說28元僅僅反映2009年的第二季度情況，而未有考慮2009至2011年的預測情況，因此滯後的工資水平，未能舒緩基層員工眼前的生活苦況。嚴重滯後的問題成為了最低工資與生俱來的缺陷，必須盡早糾正，其方法是實行「一年一檢」，即每年對最低工資水平作出檢討。「一年一檢」在海外地區比比皆是，香港從機制上沒理由做不到。

工聯會一直倡議最低工資是要保障打工仔能夠養家，因此以2008年全體僱員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及8小時工作計算，得出33元時薪的答案。可是2011年法定水平只有28元，兩者有5元的差距！去年的法定工資水平是30元，我們期望明年最低工資的新水平，須保障工人的工資購買力不被通脹蠶食，維持工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並且必須逐年收窄因滯後引伸的差距。

學者論衡

香港政改發展的角度與出路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教授 盧兆興

香港市民應該學會如何將香港的制度適應國家的政治文化，使香港特區更容易成為內地的一個示範。否則，任何政治運動將很可能加劇警員與示威者的衝突，直接或間接把特區政治「台灣化」，不利社會及政治穩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改革發展是充滿困難的，因為整個政改的爭論是不同意識形態的衝突。本文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分析特區政府政改的困難和出路。

民粹主義VS保守主義

首先，整個政改爭論可以從民粹主義（Populism）和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衝突來分析。民粹主義是指民意是政策優先考慮的先決條件。在特區政改的爭論中，民粹主義愈來愈嚴重。民粹主義的產生是在2003年50萬港人遊行，反對政府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開始。當時，很多市民和公民團體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直接帶動公民社會反對政府，也把民粹主義在特區建立鞏固的基礎。2013年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裡面，我們看到很多市民、學生和公民社會團體積極參與，可說是民粹主義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的另外一個高潮。現在政治改革的爭論也是民粹主義抬頭的結果。很多親民主的團體以民意為依歸，強調將來的行政長官選舉需要公民提名，或者是公民推薦，或者是公民抗命。以公民為理由來推動民生改革是民粹主義的特點。

在西方，民粹主義往往通過政黨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特別是參與選舉。在香港，民粹主義的特點是沒有政治權力團體和政黨的形勢，從而增加了他們的挫折和激進主義。雖然民主左翼勢力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中贏得直選議席，但它們因為政治影響力薄弱迫使支持者經常以街頭示威抗爭。

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直接衝突。保守主義強調維持現狀的重要，也強調盡量在政治體制中進行小規模的改革。在特區政改爭論中，保守主義來自建制派、商界和一些內地的基本法專家。保守主義的支持者覺得特區政府不應走得太快，不應該全盤西化，不應該以民意來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施加壓力。

民主化VS國家安全

特區民主化是一個政治改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外國對特區的政改一定關注，包括美國、英國、歐盟、加拿大、日本、澳洲和其他國家。民主化的方法也有參考西方的民主制度，比如公民提名就是好的例子。可是，這些民主化的過程和方法也直接衝擊中央政府的國家安全觀念。

在中國近代史上，外國的侵略導致了中國政府關注外來干涉地方政治的可能性。首先，中央政府的國家安全概念最近十年慢慢轉變，從以前是傳統安全概念改變為包括非傳統安全概念，包括環境安全，公共衛生等等。在香港政治改革方面，北京的角度是特區民主化不應該全盤西化，因為任何外國勢力影響特區政改都是威脅國家安全。所以我們聽到一些內地的聲音說：特區應該盡快就二十三條立法以配合政治改革。

由於民主化的過程與方法跟中央的國家安全觀有衝突，特區政改自然困難重重。最近「香港2020」及「18學者」的方案可堪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藍圖不強調政黨提名，這意味著倡導者明白政黨有沒有法律依據，在香港，因為政黨根據公司法註冊。兩個方案優點是沖淡政黨角色和維持機構提名的特點。缺點是兩個方案都是把提名委員會民主化，但民主化之後是不是由於民選產生的提名委員太多而威脅國家安全，使到提名委員會不能夠篩選候選人呢？似乎兩個方案都是把提名委員會盡量民主化，看來觸動國家安全利益的底線。因為假如提名委員會大部分成員都是民選直接或間接產生的話，篩選的機會就減少。

適合中央及港人利益的方案

一個較為符合中央利益和港人利益的方案，比如可以把2012年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簡單地改變為行政長官選舉提名委員會，然後任何人拿到1/8的提名就可以成為候選人，而每一個委員只可以提名一位候選人，最後由提名委員從最多八個候選人中選出三個候選人給有資格投票的全香港市民投票，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在一輪選舉中便成為行政長官。

假如「民主派」要求「公民推薦」，筆者個人認為「公民推薦」不符合權力來自機構的內地概念。所

以香港人可以要求公民參與，而不是公民提名或推薦候選人給提名委員會。所謂「公民參與」，即是說公民在提名委員會之前，可以舉辦公聽會及民意調查，鼓勵市民參與，表達他們心中候選人的意見，甚至在提名期後向候選人問問題。最後提名委員會委員投票決定最後那三個候選人給市民選出行政長官。

很多支持民主的港人堅持自己的角度，但是他們忘記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民主化可以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方選舉。所以港人應該「退兩步」：即放棄公民提名，放棄公民抗命；「進一步」，即是首先照顧中央和內地法律專家的國家安全考慮，爭取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選舉，然後慢慢在2017年之後修改選舉方法，再慢慢民主化。假如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不能夠落實的話，這個可能是有些港人太過強硬而浪費2017年民主化的黃金機會。

台灣民粹主義之殷鑒

最近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使我們看到台灣民粹主義抬頭，使將來北京和台灣任何談判更加困難。香港2005年政改不能夠在立法會通過的時候，台灣的執政黨是民進黨。但是2010年香港政改有突破的時候，台灣執政黨是國民黨。所以當民進黨將來可能在台灣「總統選舉」打敗國民黨的話，香港民主化也可能受到影響。

支持民主化的港人應該務實一點，在北京台灣關係未有轉壞之前，退兩步，進一步，落實中國土地上第一個地方政府首長在2017年由直選產生。否則的話，任何「佔中」行動可能導致警員與市民衝突；可能把香港政治台灣化，可能把香港民粹主義跟保守主義衝突得更厲害，把香港民主化更明顯地威脅中央的國家安全。

立法會可參「兩會制」

2020年立法會選舉方法應考慮採取兩院制。這意



▲在香港政治改革方面，北京的角度是特區民主化不應該全盤西化，因為任何外國勢力影響特區政改都是威脅國家安全

味着將有一個上議院成員來自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和一個完全直接選舉產生的下議院成員。分組點票機制應予維持，但上議院對下議院決定的否決每年可減少到一定次數。由於商界希望維持功能組別，任何政治運動廢除所有立法會功能組別看來難以為商界所接受。

在西方，政治是可能的藝術。但在中國，政治是肯定的藝術。在西方，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在中國，政治是由中央政府的決策藝術。因此，香港的人應該學會如何將香港的制度適應國家的政治文化。

結論：應把握關鍵機遇

我建議的解決方案是務實的，因為香港人應了解2017年達到中國土地上第一個地方政府首長直接由民選的重要性。香港的人應該學會如何將香港的制度適應國家的政治文化，使香港特區更容易成為內地的一個示範。否則，任何政治運動將很可能加劇警員與示威者的衝突，直接或間接把特區政治上台灣化，不利社會及政治穩定。

□林修祺

台灣「黑色運動」的教訓

台灣的「佔院」學生退場，不等於反服貿「黑色運動」結束。「佔院總指揮」陳為廷8日率全體學運幹部在「議場」發表題為「轉守為攻 出關播種」的聲明，揚言要把學運擴大為遍地開花的社會運動，鞏固並延展戰果。中、南部學生組成的「民主黑潮聯盟」則反對退場，號召「黑潮回流 延續太陽花運動」。由16個「獨派團體」組成的「自由台灣陣線」於同日成立，宣布將繼續死守「立法院」正門廣場。由此可見，綠營要「繼續革命」，將反服貿「黑色運動」進行到底。

有預謀部署的顏色革命

事實證明，這是民進黨和綠營「獨派團體」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部署的一場「黑色革命」。早在去年下半年已經醞釀、準備和造勢，就是民進黨團和綠委發動一波接一波的杯葛，千方百計拖延和阻撓服貿協議進入審查程序；綠營團體更提出顛覆性主張，以釜底抽薪之計來阻撓或否定包括服貿在內的一切兩岸經貿協議，即要「立法院」先行制訂「兩岸協議簽訂與監督條例」和「中資來台投資條例」，還要修訂《華僑及外人投資條例》、《就業服務法》、《企業

併購法》等法案，在未完備相關法制之前，服貿協議不得進入審議程序。此外，還持續發動反服貿宣傳攻勢，為「黑色革命」作好輿論準備。

「太陽花學運」是「革命急先鋒」，在佔領「立法院」之前就成立學運「決策小組」，在3月16日開過一次戰前決策會議，作出具體的分工部署和最後準備。這個決策核心由民進黨和綠營學者組成，包括清華大學社會所所長姚人多、教授陳明祺。陳明祺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研究員。姚人多曾在謝長廷、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期間出任主席特助，蔡英文的重要演講稿多由他草擬，並參與起草《十年政綱》，姚人多就是「太陽花學運」的幕後總指揮。學運的台前主角、「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領袖林飛帆、魏揚和姚郁芬，都是清華大學社會所學生，即姚人多的學生。兩名幕前總指揮林飛帆和陳為廷是民進黨員，也是「台灣獨」支持者。林飛帆曾是蔡英文宜蘭競選總部青年軍；陳為廷是台大政治所學生，曾任蔡英文黃長鎮苗栗競選總部青年後援會會長。指揮攻進「行政院」的魏揚，曾是小英基金會實習生，被分配在民進黨立委姚文智辦公室實習。由此可見，「太陽花學運」並非神

「立法院長」王金平處理「佔院」不但沒承擔責任，還幸災樂禍，拒絕與國民黨馬政府協商處理。直

至「佔院」第20天突然前往「立法院」慰問學生，並擅自應允「先立法，後審議」的訴求，於是王成為「黑色革命」的「摘桃派」，同時狠辣了馬英九和國民黨一軍。國民黨團對王的言行「非常錯愕」，「感覺整個黨被出賣」。卑劣的是，馬7日晚發表聲明，強調「王院長」的看法與其政府的一貫主張並不衝突，應以正面態度看待。這是愚怯失敗者的阿Q精神。聖，而是由民進黨和綠營策動、操縱和利用。

王金平與綠營勾聯造反

所謂「先立法，後審議」，其實是極力拖延甚至退回服貿協議的陰謀。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除「行政院」版本，還有各種不同的民間版本，少說也要拖三個月到半年。以「獨派」林飛帆為首提出的民間版，把兩岸關係定位為「兩國關係」；他們揚言，如果政府不接受其提交的版本，就抗爭升級，發動民眾包圍「總統府」。

王金平在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貼身伴隨下與「佔院」學生握手談話的「經典鏡頭」，揭示了台灣「黑色革命」的特點，就是國民黨內奸與綠營勾聯造反。王是李登輝布置在國民黨的戰略臥底，他縱容包庇民

進黨綁架「立法院」，已等同「立法政變」。去年他與柯建銘深陷司法關說案，被國民黨考紀會開除黨籍，他提出司法訴訟，司法機關不但判他連勝，還要追究檢察總長和馬英九「非法監聽」與「泄密」，實質就是「司法政變」。「三權」之中已有「兩權」變了天，剩下的行政權亦陷入「無能」的困境，經過今次「黑色革命」，馬英九已由「跛腳鴨」變成「斷腳馬」。

馬提出要拚經濟，卻欠缺必要的政治膽識。綠營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不惜破壞兩岸協議、犧牲台灣經濟發展，馬對此不可能愚昧無知，以監督的實力和國民黨有執政的優勢，亦非無力反制。問題在於馬英九國民黨一直有「恐共怕統」的心魔，對兩岸關係採取「以拖待變」戰略，而對民進黨和綠營「獨派」[逢中必反]的訴求和行動，刻意忍讓妥協甚至縱容，以期「善用台灣政黨政治與多元社會」，達成「雙層賽局」之策略運用。殊不知民進黨和綠營讓馬英九和國民黨的心魔和死穴，大造對岸「狼來了」的輿論準備，藉反服貿發動「顏色革命」，力圖顛覆國民黨馬政府。國民黨若能吸取這次慘痛教訓，救亡圖存也許為時未晚。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